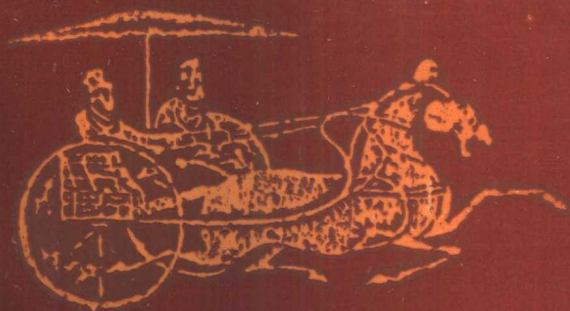


中国古代官吏

退休制度史

沈星棣
沈凤舞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

沈星棣 沈凤舞 著 • 江西教育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 002 号

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

沈星棣 沈凤舞

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

(南昌市老贡院 8 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昌市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33.5 万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5392-1179-2/K·10

定价: 6.40 元

序 言

沈星棣同志是我的学生，转瞬就是四十年，现在也是位年过花甲的老教授了。他的近作《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即将问世，要我写篇序言，浏览之余，确是浮思联翩，有许多感想要抒说一下，为此，欣然命笔，写几点读后感，供读者参考。

（一）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宝库中最瑰丽的宝藏之一，海内外学者从中华文化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认真探索，不断涌现出富有新意的研究成果，更显示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

我国是个文明古国，五千年的历史，政治制度允称完善，研究者也是硕果累累。可是，有关官吏致仕的研究，历代学者却少涉足。这几年来，随着文化热的新潮掀起，情况稍有改变，陆续发表了一些探讨致仕的学术论文，打破了长期以来的沉寂。沈星棣同志在此期内也发表了数篇纵论我国官吏退休制度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

沈星棣同志在这股新潮中，冷静地探索了我国官吏致仕的历史过程，发现我国官吏退休制度滥觞于商周，可以说起源甚早，然而绵延数千年而未能臻于完善，一直存在相当大的随意性，没有严格的法制化。原因何在？这是值得我们深刻反思的。沈星棣同志的这本专著，不仅是带有开拓性的学术尝试，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读之，令人欣慰。

沈星棣同志在青年时就勤奋好学，惯于将各个历史人物或事件

放到所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他认为有些人孤立地评介历史现象，那是游戏而不是科学。记得他在三十年前，曾写过一篇《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便把吴三桂抗清、降清、反清变化多端的政治活动，放在明末清初封建皇朝之间大交替的大时代大背景中去探究其政治、思想的根源，引起了史学界的注意，此文发表二十年后，被北京《历史研究》编辑部收编入《历史研究丛书》之一的《明清人物论集》^①中。他在反思官吏致仕的历史演变中，也是从全方位多角度观察致仕中欲罢不能或应退未退的种种史例，视野不仅停留于政治需要、经济诱惑，更落到了学术影响、心态变异等等；而且追溯过去，推求未来。这种把问题放到整个社会历史环境中去分析、剖解的方法是辩证的、科学的，值得肯定的，因为它紧密地联系着所处时代的脉搏，雄辩地说明了症结的所在。

《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展示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个接一个皇朝的官吏退休制度的异同，以及在执行中所遇到的种种阻力。每个时代都有它难于顺利推行致仕的障碍，因此，留在后人眼中的是条曲折而艰难的道路，正像我国古代社会所走过的一样，漫长、迟缓，但又并非停滞不前。故而，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尽管由于独多磨难而使人带着一些惆怅，却又给人亟欲改变的激励，因为它与整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状况是丝丝入扣的。

（二）

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的历史现实，自然而然地使本书在结构上具有点面结合交相辉映的特点。全书总体布局是以社会历史发展线索为纲，按时间顺序分为七章，从中可以鸟瞰我国官吏退休制度的总趋势。然而，却又不是平铺直叙，每章都抓住影响至巨的核心问题进行剖析，各有重点。因此，从不断产生的每个时代的不同

^①《叛徒吴三桂政治活动中的阶级根源》原载于1963年《江西大学学报》创刊号；后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明清人物论集》，1983年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阻力中，既体现了历史锁链的环环相连，更揭示出官吏退休制度所走过的轨迹。

先秦社会经历了奴隶制的发生、发展与衰亡，以及封建制的萌芽与确立的过程。分封制随着社会性质的变动而消长，是当时政治生活的核心所在，它的消长直接影响到贵族间世卿世禄的盛衰；而世卿世禄制的盛衰又制约了官吏致仕的能否通行。因此，要了解贵族“告归”、“告老”的真相，平民参政后所带来的内在变化，都离不开分封制。“世袭制下无退休”，确是一语点到了问题的要害。

汉初功臣军吏出身的布衣公卿，结成了一股足以与皇室、外戚相对抗的政治势力，这是难于不折不扣执行致仕的症结所在。也可以说，整个两汉时代，豪族的发展，州牧郡守的权重，两重君臣之义的崇尚，都处处存在功臣军吏遗留下的影子。而这种种因素的总和，程度不等地给官吏致仕设下了道道障碍，正是“功臣军吏退为难”啊。

魏晋南北朝时世族坐大，遂至“尚姓”，在此门阀政治下谈悬车致仕，自是离不开世族在政坛上特殊的优越地位，进退自如，漫无制约，那是毋庸赘述的。

隋唐被目为“融合”的时代，风尚习俗上是胡汉融合，典章制度上则是新旧融合，官吏休致在现实中的执行，也就摆脱不了这一格局的影响。至于辽、金、元三朝为少数民族所建的政权，对汉文化承袭各有差异，因而在执行官吏退休中，也明显地带着与汉族所建皇朝不同的特点。

两宋商品经济的繁荣远过于唐，“上所独当”与“制禄之厚”，与其说是个别帝王的意志所致，毋宁说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繁华腐蚀了官吏的灵魂，贪墨成风，恋栈不已。宋廷既不能、也不愿普遍绳之重法，于是求救于理学武库，宋代“乞骸骨”之举，遂在天理、人欲交织中“五里一徘徊”了。

迟至明清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官吏退休制度渐趋完善，然而

君主集权制的强化也趋于顶点，使官吏致仕的年龄变幻无常，波动很大，致仕官吏的待遇也率由帝王的好恶而相差悬殊。“天威难测”，一语道破其中奥秘。

这种结构的一大优点，便是读完全书，对我国官吏退休制度在历代皇朝里，所以都未能趋于完善的关键，有一个比较鲜明的印象。

(三)

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历经数千年而发展得不够完善，虽然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阻力，但是社会历史有其延续性，究竟有哪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整个过程？沈星棣同志在所撰《我国历史上的传统心态与官吏退休制度》、《我国封建社会官吏退休制度和权与利现实的纠葛》^①两文中曾有所论述，这些观点贯串在全书各章之中，可以归纳为如下的四大因素。

第一，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君主的绝对权威使退休制度的法制化受到致命的挑战。我国的封建社会自始至终是君主专制政体，而且日趋强化，君主自命为天降神灵的“真命天子”，将天下看成是一己所有的财产，民间流行说法所谓赵宋皇朝、朱明皇朝，正反映了这一事实。因此，士大夫出仕，不过是卖身于帝王家的臣僚而已，所以官吏致仕也并非为了颐养天年，只是年迈体衰，耳目不聪，无力再为君主效劳，史籍往往称之为“乞骸骨”，确是入木三分地刻划出了它的本质。因此，君主的绝对权威便能使官吏退休制度的种种规定，随着其个人意志的变换而极富弹性。

其次，官吏拥有的种种特权，带来了程度不等的私人利益，这是恋栈的物质因素。封建社会是个“人治”的社会，政治权力是高于一切的支配力量，因而职权在握，便是私利所在。君主不可能孤

^①分别刊于《江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三期建校卅周年纪念专刊（《中国史研究动态》1988年第12期摘要转载）、《江西大学学报》1988年历史系论文专号。

家寡人地统治广大人民，势必豢养一批官吏，构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机器，这些官吏是统治阶级当权者中的一员，当然得分一杯羹，除了丰厚的俸禄外，还享有合法的或非法的额外收入，半生仕途，大多面团团成富家翁了，这就叫做富贵双全，富是跟着贵而光临的。

“权在利存，权去利亡”不失为确评，官吏一旦退休，不仅失去了攫取财富的机会，而且权力离身后，还有可能失去业已取得的产业。残酷的现实，使很大部分官吏年老体衰时恋栈不退，尽管有散官、闲职的授予，任子、荫补的养顾，但是权力与门第都不能与现职、现任相比。因而激励届时致仕的效果也就有限得很了。

第三，弥漫封建社会的中庸思想，对官吏退休制度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专制君主拥有了绝对权威，为了不激化矛盾，君臣都希望处理政事不走极端，有所妥协，从而使中庸思想泛滥于整个社会。它对历代皇朝致仕制度的执行，影响尤为直接。我国历代封建皇朝官吏退休的程序有一特色，即让已届退休年龄的官吏自己提出“乞骸骨”或“告老病”等请求，再由朝廷恩准，有时还得来次恩留与再请，一派你谦我让、互相关怀的气氛。这种做法的弊端是官吏也可以利用此宽容，不请不求，赖着不走。正是中庸思想的作祟，历朝对恋栈官吏，往往只略施薄谴，不为已甚。我国官吏退休制度便在这样的环境下，拖泥带水地走完了长长数千年之久的封建时代。

最后，在我国古代，道德观念压倒了法制概念，遂使官吏退休虽有制度，却并不具有严格意义上的制度性质。我国自古以来便是礼义之邦，因而道德规范远比法制更深入人心，所起的作用也远远超过一般的法规与制度，于是各级官吏届时是否退休，主要倒非遵守法制的问题，而归结为道德修养的高低。因为人们认为官吏届时退休乃是为了避贤者、长廉耻，这便属于道德范畴。道德法则仅仅对讲究操守、重视名节的官吏有约束，对醉心名利者是毫无作用的。因此，官僚士大夫中，特别是居高位者，大多乐于将官归于道德范畴，而不愿它严格法制化。因为法制面前没有特权存在的余地，

作为道德问题便可模模糊糊地拖下去，这一拖就拖了几千年。

(四)

《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史》在写法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典型人物的详析与群像列举互为补充，那是很费劲的细磨工夫，却使结论更有说服力。

书中列举西汉初期的九相几乎都是终身职，这是军吏公卿退为难的铁证。申屠嘉以后的十二相情况迥异，应给执行致仕制度一个良机了。但是，汉初郡国守相地位既崇，又拥有众多特权，致仕的推行也不容易，本书将《汉书》诸传中提到曾任郡国守相的九十六人，分成五类，既有典型人物的重点剖析，又有群像的比例数字，结果是在原位致仕的仅七人，管中窥豹，由一斑可知全貌。东汉功臣并未出现退为难的问题，是由于光武帝的处置得当，那也是从一分析东汉初三十三功臣的具体情况，得到的结论。

唐初高级官吏中致仕制度执行得尚较顺利，也不只是归结于享有较优待遇而遽下定论，而是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归类分析，从乞骸骨获准、未届致仕年龄病卒于任、已届致仕年龄未获批准终于死在任上、因罪或因冤而死四种不同类型的数字比例，得出执行情况较好的结论，那是科学的态度。尤其难得的是，对在武则天执政五十三年内见于纪传的大小官吏一百七十八人的政治结局，进行分类比较，从大体上勾画退出政治舞台的三条途径外，又细分为十七种类别，不仅详述典型事例，还罗列群像简况，最后列表以资比较，得出了特殊情况下致仕不正常的结论，那是令人信服的。

这类写法贯穿全书，几乎各章可见，如论述辽对致仕官吏虽优礼却不失正常，元行世袭制与严格致仕的民族差别，明清致仕中分为三六九等，诸如此类，也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综观这部专著的全文，可见，沈墨棟同志的治学态度是认真、严谨的；在文献史料上也花了很大心力，广为搜集，并作了精密分类

和比较研究，对中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进行辛勤的探源索流和细致的分析论评，并提出了自己的某些可贵的一家之说，是值得细读的。学术问题，百家争鸣。每一具有开拓性的新论新著，难免存在某些不足乃至疏失之处，希望国内外专家学者们多多指正，使中国古代官吏制度这一学科的研究，能及时提高，日益完善。

吴泽书于上海丽娃河滨寓所

1991年12月28日

前 言

历史永远在前进，从总趋势上讲，自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人类社会从原始人群起步，迈过文明的门槛，历经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而奔向共产主义世界，尽管漫长而艰辛，毕竟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但是，历史进程像任何事物一样，不可能都是一帆风顺，直线发展，在个别的时代，或是某个领域中，都可能出现漩涡、暗礁和逆流，于是便会暂停不前，甚至倒退。

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便是如此。

一个国家行政机构效率的高低，是政权的生命，保持高效率的一条重要途径，便是官吏队伍的吐故纳新。如果说，官吏的选拔是纳新，那么官吏的退休便是吐故。我国古籍所称的致仕、休致、致事、告老、乞退、归隐、告归、乞骸骨等等，都是指官吏退休。我国历史上，官吏退休制度起源很早，历代皇朝也曾求其完善，可是数千年来却一直徘徊难前，举步维艰，直到封建社会终结，尚未臻于完善。

然而，历史是不会长期停滞的。恩格斯说：“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并且只能是人的启示。”^①人类社会不断前进的原因，就在于人类能够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或教训。正因为如此，人的活动才赋予历史一种自我调节的功能，使它能够摆脱漩涡，超越暗礁，冲破逆流，汹涌澎湃地奔腾向前。因此，历史的停滞或倒退只能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从历

^①《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651页。

史的角度去考察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正是为了探索它的发展规律，弄清它所以举步维艰的原因。

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是政治制度的构成部分，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又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而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又都相互影响，并且影响到经济基础。总而言之，历史是整体，事物既是相互联系，又是相互制约的，只有从这个普遍的相互作用出发，才能挖掘出现实的因果关系，才能了解个别现象。因此，回顾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的得失，势必涉及到整个时代的有关部分；而导致它历时数千年发展未臻完善的原因，既有其共同性，又有每个时代的特有故障，所以也必须抓住当时社会中对其影响最巨大的环节。这就是说：既要到历史的整体中去探索，孤立的、静止的观察是徒劳的；又要扣紧时代的特点。这就是我们研究问题的出发点。

我们对历史进行反思，无论是整体还是局部，简单的比拟是可笑的，因为今天的时代与过去已有质的区别，不同质的事物是无法比较的。但是前人的足迹，无论它是怎样的蹒跚歪斜，毕竟能给后人以启迪，是前车之鉴也好，是引路明灯也好，它总是有益的，这也是历史科学永远伴随着人类经久不衰的根据。

目 录

序言

前言

第一章	世卿世禄与告归.....	(1)
一	伊尹告归.....	(2)
二	贵族政治的尊老仪式.....	(8)
三	宝塔崩坏中的“老”.....	(15)
四	平民跻身仕途.....	(22)
五	尚贤使能蔚为风尚.....	(29)
六	客卿纵横话致事.....	(35)
七	秦祚短,秦政暴.....	(43)
第二章	功臣军吏退为难.....	(52)
一	布衣成为功臣以后.....	(52)
二	吕后哭子.....	(60)
三	军吏公卿退为难.....	(69)
四	郡国制下的守与相.....	(80)
五	“乞骸骨”的浪潮.....	(89)
六	政治荣誉有前提.....	(98)
七	君主与豪族的矛盾统一.....	(106)
八	崇尚名节的时代.....	(117)
九	争雄天下死方休.....	(128)
第三章	门阀政治下的悬车.....	(141)
一	世族坐大遂至“尚姓”.....	(141)
二	百岁老官僚.....	(149)

三	从清议、清淡到清职·····	(156)
四	优游山林者多了起来·····	(163)
五	朝廷易垮门第难倒? ·····	(169)
六	门第里提出的“擢贤良” ·····	(179)
第四章	一个“融合”时代的休致途径·····	(185)
一	只有礼遇的休致·····	(186)
二	经以致用论治道·····	(191)
三	新制度夹杂着旧传统·····	(197)
四	凌烟阁功臣与致仕待遇·····	(203)
五	女皇斥旧人、擢新人·····	(211)
六	退出政治舞台的三条途径·····	(220)
七	盛唐后恼人的官场“四大” ·····	(233)
八	林下何曾见一人·····	(241)
九	跋扈将帅自主去留·····	(249)
第五章	天理、人欲交织下的“乞骸骨” ·····	(257)
一	黄袍加身后的反思·····	(258)
二	权的丧失与利的回报·····	(270)
三	潜移默化的理学武库·····	(281)
四	繁华下的制度与风气·····	(288)
五	党争中的致仕·····	(299)
六	犹是东宫二品臣·····	(305)
七	老年人朝廷·····	(316)
第六章	北方民族所建皇朝的官吏退休·····	(324)
一	中庸之道淡一些·····	(325)
二	汉文化浸润下的别支·····	(330)
三	承袭中的差异·····	(341)
四	不得致仕的官职·····	(349)
第七章	天威难测话致仕·····	(355)
一	“家天下”观念的登峰造极·····	(356)

二	君权对官吏致仕的绝对权威·····	(362)
三	虚与实的赏赐·····	(369)
四	是公益还是公害? ·····	(376)
五	致仕也有三六九等·····	(380)
六	天上星宿的富贵·····	(388)

附记

第一章

世卿世禄与告归

夏、商、周被古人总称为三代。

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脉相承的三个奴隶制国家，孔子说过：“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①三代确实有不少互相因袭的地方，包括至关重要的分封制。

三代的创建者分属于三个不同的族，建国后都没有割断本族的血缘纽带，而是以血亲关系分封了不少与国，作为辅翼王室的支柱。如夏“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缙氏、辛氏、冥氏、斟戈氏”^②；商“契为子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③。可知散处各地的诸侯，有不少是同姓血亲中的一支。周初分封，据血缘为亲，以姬姓为主，更是确凿无疑。《左传》载：“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④；荀况也说：“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⑤。由于同姓不婚的习俗，王室、王室的同姓诸侯与各异姓诸侯间又结成了甥舅之邦，血缘的连接遂化而成为地域性的政治统治机构。由此而派生出嫡长子继承制、世卿世禄制，形成了贵族垄断

①《论语·为政》。

②《史记·夏本纪》。

③《史记·殷本纪》。

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⑤《荀子·儒效》所述的姬姓国家少了两个，可能是减除了叛后的管、蔡两国。

政治的局面，官吏退休制度势必受其制约。

平王东迁带来一个历史转变的契机，春秋、战国之际奴隶主贵族没落了，随着封建制度的兴起，平民跻身政治舞台，按理应该给官吏退休制度带来一副新面貌，可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直到秦代还是一部三摆。

因此，回顾我国古代官吏退休制度的开端，便会发现它所受的阻力不小，步伐便是摇摇晃晃，并不轻快。

一 伊尹告归

千国万国话诸侯

夏王朝流传至今的史籍不多，很多制度已无从稽考了。商王朝有些不同，或以为古文《尚书·商书·咸有一德》所云：“伊尹既复政厥辟，将告归”，为见诸古籍的我国官吏退休制度的滥觞。《尚书》保留着不少三代的官方文件，《咸有一德》据宋代蔡沈称，是“伊尹致仕而去，恐太甲德不纯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训体也”；“告归”便是“伊尹已还政太甲，将告老而归私邑”^①，也就是题解中说的致仕。

如果我们对三代的政治体制有个全面的正确了解，便会懂得这句话所记述的，只是贵族政治下的一桩特殊的历史事件，并非是严格意义上的官吏退休。

夏、商、周建国时，都存在着大量的诸侯，“传称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成汤受命，其存者三千余国。武王观兵，有千八百国。”^②这些“执玉帛”表示臣服的诸侯，都是具有一定实力的地区统治者，梁启超曾论断过夏商期间的“所谓诸侯，皆远古自然发生之部落。非天子之所能建之，能废之。真正封建，自周公

^①蔡沈：《书经集解》，中国书店1984年《四书五经》版。

^②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一。